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依靠制度创新	1
第二节 经济增长与实现全面小康	4
第三节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的 10 年历程	10
第一章 我国经济失衡和宏观调控的新变化	23
第一节 经济增长速度在持续下降中开始出现回升	23
第二节 物价持续回落中潜在通胀压力仍高	26
第三节 财政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中的政策作用方式和 力度不断变化	29
第四节 我国现阶段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政策间的结构特征分析	31
第二章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新的跨越	45
第一节 改革开放与中国崛起	45
第二节 中国国民收入的国际比较和对“中等收入”的进一步讨论	48
第三节 中国有可能保持强劲增长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 目标	70
第四节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	76
第五节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16

第三章 准确理解中国的收入、消费和投资	122
第一节 宏观收入分配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需求和 固定资本投资需求	122
第二节 资金流量表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住户调查中的居民 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区别	123
第三节 支出法 GDP 中的居民消费与住户调查中的居民消费之间的 区别	132
第四节 投资统计中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区别与支出法 GDP 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37
第五节 基本结论	141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产业结构变化的特征及趋势	143
第一节 高速增长下的产业结构变化:实际增长和价格影响	145
第二节 增加值结构与就业结构	172
第三节 三次产业的收入结构与劳动生产率分析	178
第四节 产业结构变化的国际比较	191
第五节 结论	203
第五章 对中国“刘易斯转折”阶段进程的判断及对劳动力成本上升 效应研究	206
第一节 文献综述及理论分析	207
第二节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农产品及食品价格的影响	213
第三节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服务价格的影响	230
第四节 制造业各行业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比较分析	241
第五节 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成因及发展趋势	247
第六节 刘易斯转折阶段劳动力成本变动的国际经验借鉴	269
第七节 适应和应对中长期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政策建议	275
第六章 全球化战略与中国长期经济发展	280
第一节 中国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国际地位的巨大提升	280
第二节 与各大洲对外贸易现状的动态变化	284
第三节 中国对外经贸合作的内容和特点	286
第四节 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经贸关系的发展	294
第五节 全球化战略与中国经济增长	302



第七章 2012 年经济形势分析和 2013 年经济形势展望	320
第一节 2012 年经济形势分析	320
第二节 2013 年经济形势展望	336
参考文献	341

绪 论

第一节 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依靠制度创新

经过新时期以来近 34 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经济实现了年均 9.8% 左右的增长,到 2012 年年末 GDP 总量已经为新时期初的 24 倍(按不变价),达到 51.93 万亿元(按现行价),按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 8 万亿美元以上,占全球 GDP 比重达 10% 以上。人均 GDP 实现了年均 8.75% 左右的增长,到 2012 年年末将达到新时期初增长近 17.35 倍(按不变价),超过 3.8 万元(按现行价),按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 5 800 美元以上,成为上中等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过渡阶段。

这一阶段的经济面临两种可能:一是在不长的时期里实现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当代世界到 2011 年,按汇率法(The Atlas Method)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Per Capita GNI)达到高收入标准(12 476 美元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共有 70 个^①,其中相当一部分国家和地区是在 20 世纪后半叶和 21 世纪前十年通过高速增长实现了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二是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经济无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即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诸如历史上的“拉美漩涡”、“东亚泡沫”以及目前的“中东北非危机”等。在 2011 年年末,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4 036 美元)但又低于 12 476 美元的国家或地区共有 54 个(即所谓上中等收入经济体^②),包括我国在内,都面临这两种可能。尽管对于何谓“中等收入”有不同认识,对于是以绝对水平还是以相对水平作为划分根据有不同看法,但是“中等收入”、“高收入”、“现代化”等都是历史的范畴,都只能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相互比较所达到的水平,并不是孤立绝对的数字体现,划分发展阶段除考虑这种历史发展的相对性外,重要的是还要在考虑 GDP 水平的同时,考虑经济结构的演进高度。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 2020 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在经济规模上,实现 GDP 总

^① 参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worldbank.org/about/country-classifications/country-and-lending-groups#High_income。

^② 这一上中等收入的概念是由区间而不是标志数值来划分的,从与标志数值比较上看,我国才刚刚跨越中等收入水平,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但由于处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标志数值之间,因此被划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的类别中。

量较 2010 年翻一番,按 2010 年不变价计算将突破 80 万亿元,只要年均增长率达到 7.2% 左右即可实现;人均 GDP 同样翻一番,达到人均 6 万多元,近 1 万美元(按目前汇率),只要总量倍增的同时,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前些年的水平(5% 以下)上即可;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2010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 万多元,翻一番即近 4 万元(不变价),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近 6 000 元,翻一番即为 1.2 万元(不变价),只要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与 GDP 增速同步,同时城乡差距至少不再扩大,就可以实现。在经济结构上,实现四个方面的现代化,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到 2020 年,按当代国际现代化标准,基本实现工业化目标,我国目前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加速发展阶段,到 2020 年实现工业化目标在发展速度上是可能的,关键在于提升水平,即推进新型工业化。在信息化建设上,一方面在产业结构高度上提升以现代信息技术支持的现代服务业及整个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之与全面小康社会发展阶段要求相适应,至少应达到 60% 以上,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大幅提高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之间的融合与协调程度。在城镇化的发展上,我国 2011 年城镇化率已从新时期之初的 20% 以下提高到 51.3%,虽然远不及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 2009 年城市人口首次超过 50%),但已进入通常所说的城镇化加速期(30%—70%),在新型工业化基本完成,农业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的条件下,城镇化速度必然进一步加快,到 2020 年达到 65% 左右(接近高收入阶段水平)是可能的,关键在于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使之与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的进程有机统一。在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上,以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不断下降作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标志,我国 2010 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已从新时期之初的 70% 以上(当代贫困国家平均在 72% 以上)降至 36.7%(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依此速度到 2020 年降至 20% 以下(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是有可能的。如果到 2020 年我们从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两方面均实现全面小康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即基本实现了我国经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因此,至 2020 年这一时期是我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

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取决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经济增长的方式来说,重要的是能否实现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拉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及全要素效率提高拉动增长,由主要依靠成本低作为竞争优势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及效率提升作为核心竞争力;从经济发展的质态来说,重要的在于经济结构的演进,即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包括总需求方面的投资、消费、出口间及各自内部的结构调整,总供给方面的三大产业间及各自产业内部门结构的演变等。总结世界各国或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及教训,能否实现跨越的根本原因即在于能否实现发展方式的历史转变。



怎样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本动力在于依靠创新驱动。一方面是技术创新,包括原始、集合、吸收、引进、借鉴等多种形式的创新,社会教育及卫生等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企业研发的投入等,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结构转变的战略支撑。效率提高是创新的函数,结构演进则又是效率提高的函数。另一方面,由于制度重于技术,一切重大技术创新,或者说社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均是以制度创新为前提的。具有活力和竞争性,同时又具有秩序和公正性的社会制度安排,是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制度基础。在我国现阶段,制度创新的历史内涵即通过深化改革培育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则是实现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

经过34年的改革,我国目前已基本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已经确立,市场体系业已形成,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仍亟待完善。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中曾预言:“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①如果从1992年算起,再过30年就是2022年,恰恰正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前后,从历史进程的时间表来看,这种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将有可能基本形成。这是和邓小平的预言相吻合的。2020年前后,不仅是我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同时也是我国建成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攻关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改革本身面临的任务和约束也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化。其一,在改革的核心环节的选择上,即政府与企业改革的相互关系上,从开始的以企业(国企)改革为核心,逐步转变为以政府职能转变和相应体制改革为关键;其二,在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改革的方式和内容上,从开始的国有企业为企业改革的主要,且以政府行政性推动为基本方式,逐步转变为多种经济混合所有制和企业产权多元化状态中的企业改革为主要,且以企业市场性自主选择为基本方式;其三,在作为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内容即市场体系的构建上,从前期的构建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在内的商品市场化为基本,逐步转变为包括土地、资本(货币)、劳动、专利、环境等要素市场化为基本;其四,在面临和处理市场化真正的难题上,从以往努力克服传统计划经济的阻力,拓展市场机制作用空间,使之替代传统计划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为主要困难,逐渐转变为以完善市场秩序,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秩序(企业产权)、交易秩序(价格制度)、法治秩序、道德秩序等在内的秩序完善,即从扩展市场作用规模向提升市场质量(公正有序)转变为真正困难;其五,在作为二元经济状态下改革重点领域的选择上,从前期的城乡分别展开全面改革,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2页。

逐渐转变为城乡统筹,形成改革的统一整体,尤其是这种城乡协调统筹的改革进程,需要同要素市场化,特别是土地、资本及劳动等要素市场化的深入及完善相互协调;其六,在作为改革绩效检验的标准倾向上,从贫困时期的更强调提高生产领域中的效率及提升人们物质生活水平,逐渐转变为在强调生产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分配领域中的公平,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更加注重人们更高层次、更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要求;等等。这些方面改革的复杂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进行的各项改革,而且从阶段性上看,已经进入了改革的高级阶段。正因为如此,我国开始真正进入了改革的攻坚期。我们只有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要求,进一步明确改革的历史使命,通过深化改革推动制度创新,进而推动技术创新,在制度和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推动经济结构的升级,实现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第二节 经济增长与实现全面小康

一、必须准确认识全面小康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这一宏伟目标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就其经济方面而言,首先要清楚认识的是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的内涵。

第一,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经济总量目标,即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进入新世纪我们预定的增长目标是到2010年比2000年GDP总量增长1倍,到2020年再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即比2000年增长4倍,但实际上在2007年我国便实现了原定10年增长1倍的计划目标,到2010年GDP总量已是2000年的2.6倍。党的十八大提出在2010年基础上到2020年再增长1倍,显然是基于已有的高速发展的事实,进一步提高了增长目标的要求。实现这一总量增长目标,要求自2011年到2020年的10年里,年均GDP增长率达到7.2%,2010年我国GDP总量为40多万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到2020年翻一番即为80多万亿元。如果在GDP总量翻一番的同时,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近十几年来的平均水平,即保持在3‰左右,则人口增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么人均GDP便可同时翻一番;在人均GDP同时翻番的条件下,如果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保持同步,那么,居民收入便可相应实现翻一番。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万多元,翻一番则近4万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900多元,翻一番则近1.2万元。这里,重要的在于,一是GDP总量年均增长率达到7.2%,二是GDP的增速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速保持一致。实现这一翻番目标,则我国GDP总量按汇率法折算为14万亿美元左右,接近美国2010年GDP总量,人均GDP则达到1万美元,显著缩小与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



经济国家标准(1.2 万美元)间的差距。

第二,总量增长的同时社会经济必须发生深刻的结构变化,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促进同步发展。就工业化而言,按当代国际工业化标准,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达省区已接近基本完成工业化,全国则要在 2020 年基本实现工业化,这里的关键不是工业比重的上升和规模的扩张,而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就信息化而言,重点在于在信息化大幅度提升的同时,加深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等国民经济多方面和人们生活多方面的深度融合。就城镇化而言,我国 2011 年城镇化率已达 51.3%,进入了通常所说的 30%—70% 的城市化加速发展期,以我国近些年来年均城镇化率上升 1 个百分点略多的经验,预计到 2020 年与经济增长翻番相适应,城镇化水平将达到 60% 以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同时提高城镇化质量。就农业现代化而言,以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变化为例,我国 2010 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为 36.7%,根据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及相应的农业就业比重下降的经验,到 2020 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下降到 20% 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将显著缩小与当代高收入发展中国家(10% 以下)的差距和与发达国家(5% 左右)的差距,这里重要的问题在于使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必须强调的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目标,应当使 GDP 数量增长与经济发展质态提升统一起来,单纯的 GDP 翻番及居民人均收入翻番,并不意味着实现实质性的全面小康的经济成长,而是必须在此基础上同时实现经济质态的改进,即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大幅提升的信息化及质量不断提高的城镇化。仅有 GDP 规模扩大但经济结构落后则不成其为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水平。如 19 世纪初的我国,GDP 数量按现在的统计方法计算比当时的英、法等国要大,但我们 GDP 的结构是以传统的农业经济支持的,而当时英、法等国规模虽不及我国,但却是以现代化的工业支持的。又如当代石油输出国,人均 GDP 水平很高,但经济结构远未达到现代化的标准,是富而不强。因此,十八大特别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 GDP 和居民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

二、如何看待 GDP 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双重目标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在经济增长上,2020 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提法比起十六大、十七大上提出的增长目标,在数量目标上有两个变化:一是在总量增长上,比原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居民收入第一次有了定量的增长

目标。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时提出:“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①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②十六大上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新目标,是在我国已经取得了二十多年的高增长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实际上意味着在新世纪的前2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要达到7.2%,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增长目标。而在实际增长上,由于我国在新世纪初的高速经济增长,到了2007年,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十五大提出的在新世纪前1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十六大提出的前20年翻两番的目标也可能大大提前,因此,在党的十七大上,我国的增长目标调整为人均GDP翻两番,这比原先GDP翻两番的增长目标有所提高。但无论是GDP翻两番,还是人均GDP翻两番,从目前的情况看,都可能大大提前。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2012年的GDP已经达到了2000年的3.18倍,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12%,也就是说,由于在上一阶段中国取得了更快的经济增长,因此在未来的八年里,只要在2012年的基础上,再增长25%就能够完成十六大提出的翻两番的目标。如果按“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年均增长率为7%以上,那么在2016年就能超额完成总量和人均目标。而如果要在2020年完成目标,那么每年只要达到3%的经济增长率就能实现。因此,在十八大上提出的新增长目标(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或年均增长7.2%),实际上是要求在未来的八年里,中国要取得比十六大、十七大预定目标更大幅度的经济增长。

(一) 改革开放以来各个阶段的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由于多年的徘徊,和世界各国本来已经缩小的差距又重新扩大,在世界上属于贫困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通过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设想,后来,他又把这一设想发展成为“三步走”的战略构思。第一步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即达到500美元,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在20世纪用30年到50年的时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

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②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



水平这一设想以及奋斗目标的出发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结束 100 多年来挨打和落后的历史。1982 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 20 世纪末实现中国的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在党的十三大上,“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则被完整地写进大会报告中,作为党和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最为重要的目标,而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又选择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这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

从 1982 年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提出的经济增长数量目标后,30 年来,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都被提前实现。1987 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中国 GDP 总量达到了 1980 年的 2.04 倍,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一个翻番的目标。

1992 年,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我国掀起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热潮。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九十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原定为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现在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情况来看,可以更快一些。根据初步测算,增长百分之八到九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向这个目标前进。”^①党的十四大上,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后,我们推动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为后来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1995 年,我国的 GDP 总量达到了 1980 年的 4.33 倍,提前五年完成了翻两番的经济增长战略目标。2000 年中国 GDP 总量为 1980 年的 6.55 倍,比原先翻两番的目标多出 2.55 倍。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②进入新世纪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2012 年,我国按可比价格计算的 GDP 总量已经达到了 1978 年的 24 倍,早已经完成了邓小平当年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定量目标(16 倍),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和进入小康社会的定性目标可以说已经实现。但是离第三步“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的定性目标,应该说还有差距。

①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2 年。

②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 年。

（二）GDP 与居民收入同步增长的意义

早在 1978 年,邓小平就提出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①现在“先富起来”的目标可以说已经实现,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这一方面表现在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平均水平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和平均收入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仍存在着差距。另一方面表现在收入分配不均衡,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仍然有困难,而老百姓更多的是从自身的收入和生活变化以及相互比较上去感受国家的发展,收入差距较大,尤其是绝对贫困人口的存在,是我们当前尤其应该重视的矛盾。这种地区间、人群间收入发展的失衡当然是发展中的问题,但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正因为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需要改善,才继续为我们创造了大量的需求。党的十八大同时提出了 GDP 与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它把改善民生和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体现了党和国家在新时期新的发展思路。改善居民收入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以及消费,首先是社会公平的需要,即全体人民共同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成果;同时,这也是改善宏观效率的需要,因为如果居民的收入(尤其是低收入居民家庭的收入)不能和经济增长同步,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投资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形成的产能和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也会越来越大,追求经济增长的愿望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形成生产力的巨大闲置和浪费,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改善人民生活。虽然在经济增长的不同时期,是在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在等量的经济增长下,对居民收入和生活改善的力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经济增长最终还是要体现在人民生活上,不仅是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居民的就业和收入增长,现在也是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标,而经济增长则是为改善就业和居民收入服务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量化了经济增长指标,而且使它成为最重要的发展目标,中国的经济增长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实现的。虽然世界各国都在讲 GDP,但是像中国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直接推动 GDP 的增长,而且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情况,在世界范围都是罕见的。但是这样做没有错,贫穷落后的中国要实现伟大复兴,不这样发展经济是不行的。只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在用数量指标促进和考核 GDP 增长的时候,对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则一直是定性要求,没有数量规定。这样,在现实生活中,就容易出现 GDP 的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不同步的现象,更多的国民收入会被转入生产部门进行投资而换取

^①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52 页。



短期的较快增长,从而导致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企业、政府、金融机构所占比重不断增加,而住户部门(居民)所占比重不断降低,最终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并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更加重视居民收入的改善,不仅是社会公平的需要,也是改善经济效率的需要。

事实上,居民收入的改善是受经济增长约束的,要实现居民收入翻番,首先必须实现经济总量翻番,没有经济增长所创造的成果,也就谈不上分配的改善。但是反过来,经济增长可以不受居民收入的约束,实现了经济增长后可以不用来改善居民收入和消费而用于企业的积累和投资。因此,在居民收入翻番的约束条件下实现 GDP 翻番的难度实际上加大了。居民收入的增加反映在生产领域就是企业劳动成本的上升,而在劳动成本上升的条件下,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企业的利润率可能降低进而影响它的投资能力,企业就必须通过改善经济管理和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and 市场竞争力,这对企业是严峻的考验。对整个国民经济而言也是如此,居民收入和 GDP 增长同步,意味着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综合收入份额将保持稳定,不能再把提高积累率增加投资做为实现增长的主要途径,而要更多地通过制度创新带动的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必须更多地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不是扩大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取得了 10% 左右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的规模和出口总额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中国已经从一个贫困的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一个跨过了世界银行中等收入标准的“上中等收入”的国家。一方面,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我国 2011 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达到了 4 940 美元。虽然比起过去,我们的发展水平已经有了巨大的提升,但这样的人均水平^①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还需要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很大,而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却在增加,除了要求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外,我们还要受社会发展、能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保持高增长的难度比过去明显增加。虽然提出的增长目标是类似的(10 年翻一番),但是实现目标的条件却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必须在体制、物质基础和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继续推进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基本的动力无疑仍然是改革,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要通过不断的体制创新来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需求而在供给,潜在的需求是巨大的,关键是要解决供给领域中的一系列体制性和发展性矛盾。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改革不断地解决这些矛盾,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那么我们完全有可能在

① 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在 2 500—3 000 美元之间。

2020 年实现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时,我国按现在的固定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就可以达到 10 000 美元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将步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第三节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的 10 年历程

2003 年 3 月 22 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国家统计局在北京大学英杰国际交流中心,举办了“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成立大会。这个中心的宗旨,正如其名称所表示的那样,是通过政府部门与学术机构的合作,推动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在这一方面,国家统计局尤其是国民经济核算司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有各自的优势。当时,国家统计局通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在国民经济核算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朱之鑫局长在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学习、引进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国民账户体系(SNA),经过 20 年来的努力,目前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在大的框架方面与国际标准已基本接轨。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已广泛应用于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和发展目标,判断经济形势和各项政策研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统计基础比较薄弱,国民经济核算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加入 WTO 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提出后,各方面对国民经济核算的要求更加迫切。我们要继续努力,加强统计基础资料的调查和收集,增强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性和协调能力,深入学习和学习国际标准,提高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透明度,力争拿出的数据让领导放心、群众信赖、国际认可。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是百年来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领域的学术机构之一,自成立以来^①就始终和我们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过伟大的贡献。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在新时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社会背景中,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一直走在经济理论的发展前沿,为新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何发展一支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更加紧密联系的学术团队,也是我们当时重视的问题,和国家统计局合作,强强联合,建立一个学术研究机构,系统地进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并利用这个体系提供系统数据,深入并全面地对我国经济增长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推动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也有利于建设我们的学术研究团队。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在学校的支持下建立起了我们这个研究中心。朱之鑫局长、当时的主管副局长以及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都参加了成立大会。朱之鑫局长担任中心第一任主任,许宪春司长担任中心的常务副主任。我当时在大会上说,我们在中国国民

^① 2012 年 5 月 25 日,刚刚举办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100 周年暨北大经济学科 110 周年庆祝大会。



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固然有我们自身的努力,但更要归功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正是波澜壮阔的中国经济增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舞台来施展我们的才能。中国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从一个低收入的、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经济总量占世界第六位的大国,这种巨大的经济发展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的梦想,改革开放最终使我们梦想成真,使我们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举世瞩目的成就。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整整10年过去了。在这10年中,中国经济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并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经济总量由当时的世界第六位提高到第二位,而出口总量则为全球第一,重新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在世界上最有经济影响力的大国之一,综合国力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这一中国发展最迅速的阶段,我们针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分阶段、分领域、分重点进行了长期持续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为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府决策贡献了我们微薄的力量,没有辜负成立大会上社会各界对我们的期望。《中国经济增长报告》是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学术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研究中心成立以来,每年发布一部当年的经济增长报告,为学术机构、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其他各个方面人士的学术研究和相关决策提供参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今年的这一期报告已经是我们的第十部报告。从2011年开始,本报告被教育部列为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建设项目,这既是对我们的支持,也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2003年研究中心成立时,一方面,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国内的经济调整,中国经济仍然在经历着通货紧缩,但另一方面,经历了世纪之交的市场深化改革,以及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和国内外市场环境都有比较大的改善,2002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和2003年年初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新老交替。虽然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以及面临的矛盾都已经和当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从经济周期甚至政治周期的角度看,研究中心成立时的环境和今天有很多相似之处,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3年春天,中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考验,也就是当时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在中国一些地区(香港、广东、北京等)蔓延,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形成重大的威胁,同时对一些地区的生产活动(如旅游和相关产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在战胜“非典”以后,我们参加了“非典”对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造成的影响的讨论,这是研究中心开展的最早的学术研究。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尽管在广东、北京等一些地区,“非典”对当地的经济产生一些冲击,但是就全国而言,投资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有明显的提升,而且这种提升的表现和改革开放以往的历次加速增长有所不同,它是在实施了一个较长

时期的市场化改革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后逐渐发生的,而不像以前那样有重大事件的突然推动(如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在行业发展上,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还是90年代,都是以第二产业的调整和其他产业的发展为特征的,因为第二产业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最集中、规模最大、所生产的产品偏离市场需求最多的部门,因此在转轨过程中,第二产业的发展是伴随着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造(大量国有企业关停并转)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由于国有企业在最初比非国有企业的规模大得多,即使民营企业得到很快的发展,但就整个行业而言,必然要受到国有企业改制的影响。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由于长期发展滞后,体制性的矛盾相对较少,便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和中期,加速的经济增长往往体现为第一、第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扩张。但是在2003年以后,情况有所不同,加速增长首先是从工业部门发生的,并且带动了投资的发展。从需求上看也有很大的改善,在国内突出表现为居民住宅和家用轿车的需求激增,在国际上表现为对外的出口明显增加。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消费、投资和出口来看,需求都开始旺盛。我们经过深入的研究,做出了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一轮景气周期的判断。2004年年初,我们发布了研究中心成立以后的第一部年度报告——《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4——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阶段和可能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事实证明我们当时对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判断是正确的。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经济基本上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在这个周期里,我们始终关注着中国经济增长,并在相关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按照研究中心的宗旨,我们主要进行两个密切联系着的领域的研究,即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相比较而言,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研究,但在国民经济核算领域也做了很多工作。

一、国民经济核算

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是在邓小平同志提出国民生产总值(GNP)翻两番的目标后,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原有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过渡和发展而来的。它既有中国特色(如以生产法为基本方法、按三次产业分类进行基本分类),又和国际最新标准相衔接,使用的是世界各国共同采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和账户,为衡量和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科学的指标和指标体系。中国的政府统计部门在这一体系的基础上,不断改善统计工作和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为政府、企业、学术机构和其他各个方面的用户提供了很好的决策和分析依据。研究中心成立以后,结合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和实践,由许宪春同志带领的研究团队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很多的总结、探索和研究工作。

2004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04年12月



31日,时期资料为2004年度。普查对象是在中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普查主要包括单位基本属性、就业人员、财务状况、生产经营情况、生产能力、原材料和能源消耗、科技活动情况等。普查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投入之多,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数次普查。2005年年底,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分三次发表了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分别公布了被调查单位(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的基本情况(第一号公报)、第二产业主要数据(第二号公报)和第三产业主要数据(第三号公报)。在这次普查之后,我们对这次普查工作的方法、经验和实践进行了全面总结,并在《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6》中予以发表。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利用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对中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如利用最新的统计资料说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是如何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全面的普查数据,这种分析是很难深入进行的。

近些年来,国际上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通过推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从数量方面测度和分析中国在能源、环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探索改进的路径,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国的很多地方,都出现过以牺牲环境来增加GDP的现象,在很多情况下,所形成的GDP还不足用以治理环境的费用。这种以牺牲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而换取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在获得眼前利益的情况下,牺牲掉长远利益。因此在经济增长研究中,要注重环境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在这一领域也存在着很多误区,如一些观点简单地把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等同于绿色GDP,并且主张以绿色GDP的考核来代替GDP考核,等等。其实,GDP并不仅仅是一个总量,它还反映了国民经济中的各种相互关系(如三次产业的关系、最终需求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等),所以绿色GDP或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只能是GDP核算和国民经济核算的延伸而不可能完全替代它们。我们在这一方面做了很多介绍和研究工作,比较系统地简述了联合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并研究了如何在中国推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我们用实际数据对中国在环境和能源领域的进展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研究结论。

2006年,我们出版过一本专著《走下神坛的GDP——从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刘伟和蔡志洲,2006),我们在书中指出:“在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让GDP这样普及、这样深入人心。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GNP、GDP或者国民经济核算这些概念,往往只是被一些专业人士所研究或关注。而在中国,你无论走在什么地方,都会听到人们谈论GDP,谈这一指标对中国和当地经济造成的影响,谈这一指标的优点和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GDP是一个走下

了‘神坛’的指标。”自党的十二大以来的历次党代表大会上,经济增长(也就是GDP的增长)都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如果没有把GDP提高到这样一个高度,中国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经济增长。但也应该看到,GDP及其相关的指标体系和平衡账户,毕竟是由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们经过长期而深入的研究和改进发展起来的,把GDP作为一个主要的综合指标来测度和分析国家 and 地区的发展,仍然是相当专业的工作。在网络非常发达的今天,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大量对GDP指标的批判,而在这些批判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实际上并不知道GDP是什么,不仅是普通人,就是很多经济学家,也经常在这个指标的基本概念上犯错误。在实际应用中,也大量存在着错误地理解和应用GDP的情况,并经常引起对其所反映的经济形势的误判。如在2010年中央实施了“择机退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出现了逐季回落的现象,相应地,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开始减缓。在这一期间,一些扩张过快的行业或企业确实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经济仍然是增长的,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调整中,虽然增长率暂时有所减缓,但一些结构性矛盾和过剩的产能得以调整,反而是有利于未来的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但是却有很多人把GDP增长率的回落等同于GDP本身的回落,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做出悲观的判断。研究中心成立之后,我们尤其强调要正确地理解和应用GDP指标和相关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并在这一基础上得出有根据的分析结论。许宪春同志及其带领的团队做了很多研究,强调要正确看待和应用GDP,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进行了全面的回顾、总结、展望以及深度分析,并将其发表在各年度的报告上。而我们以GDP为主要对象进行的中国经济增长分析,也是建立在我国不断发展的国民经济核算事业的基础上的。研究中心的名称不仅反映了我们的研究领域,也反映了我们的研究特点,就是要把我们的经济增长研究建立在系统地应用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利用国民收入核算、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国际收入平衡表等各个方面的数据,对相关的经济流量和存量开展全面的研究。

二、经济增长

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但伴随着这种发展,我们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发展问题,很多问题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感受,如由于体制建设没有跟上,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收入分配差异扩大,一些低收入群众的生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改善;房价上涨的幅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幅度,在一部分人通过房价增加个人财富的同时,另一部分人通过买房改善自身居住条件的难度却加大了;能源消耗迅速增长,环境保护的问题也凸显出来;等等。但无论经济如何发展,任何国家都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经济矛盾,即使是